

宁夏历史地理与文化论纲

薛正昌

(宁夏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历史以来, 历代中原王朝的外患基本来自北方。一部厚重的华夏文明史的叙写过程, 总是与抵御外族入侵的经历密切相关。从地理格局上看, 宁夏正处在中原与边地的过渡地带, 是多民族生成和融合的地方; 从军事意义上说, 宁夏是演绎和承载战争时空的地带。六盘山与贺兰山南北贯通, 成为这个地域格局上的屏障。黄河、清水河、泾水贯穿其间, 是西北地区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 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西北历史的演绎和文化的生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文化、贺兰山岩画、石窟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沙漠文化等成为黄河文化的直接载体。在这个过程中, 彰显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突出了地域文化的军事特征。

关键词: 宁夏; 历史文化; 地理; 论纲

中图分类号: K2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91(2006) 05—0045—06

中国历史上有个特殊的现象, 清代以前外患基本来自于北方。因此, 一部厚重的华夏文明史的叙写过程, 便是抵御外族入侵的历史。宁夏, 便成了防御入侵的重要区域。

宁夏山川地理走向, 是一个呈南北状的长带子。西南部是以六盘山为屏障的黄土高原, 有黄河支流泾河、清水河; 北部是以贺兰山为屏障的宁夏平原, 黄河介于六盘山与贺兰山之间, 穿插银川平原而过, 南北地理特征不完全相同。正是这种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脉与河流的走向, 形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地理格局。宁夏, 在这个地理空间中深得母亲河——黄河的恩惠, 演绎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历史口碑, 涵盖的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富庶。宁夏历史地理的发展和走向, 历史文化的生成和变迁, 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来演绎的。古代宁夏, 就是西北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区域, 文化自然也是这个大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河流山川的隔阻, 又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区域文化生成与变迁, 一是取决于文化赖以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是在这个环境中多民族不断开发的历史, 这是区域文化得以产生的主体。

宁夏区域文化赖以生成的自然地理环境, 是比较特殊的。六盘山、贺兰山, 是全国的著名山脉, 二山南北贯通, 成为关中西越宁夏的一条屏蔽。从地貌看, 南

部固原正处在黄土高原边缘, 与关中相衔接, 是丝绸之路沿边的重要都会; 北部宁夏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边缘鄂尔多斯相接, 南北生态差较大。尤其是黄河穿宁夏平原而过, 西高东低便于黄河水自流灌溉, 形成渠道纵横、阡陌相连的塞上江南气象, 地理意义上的黄河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自然格局。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里, 宁夏平原黄河灌区除历代战争影响外, 基本是传统农业区; 南部属半农半牧区。著名的丝绸之路穿宁夏南北而过, 不但浸润了原州、灵州这样的历史名城, 而且将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结晶留在了境内沿线。

宁夏古代文化以黄河、黄土高原为依托, 是西北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和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对西北历史文化的生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宁夏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南部以萧关与关中相连, 北部以贺兰山与北方大草原游牧民族相接, 宁夏的地理空间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 不但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有机地衔接起来, 而且给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汇提供了环境与气候皆为优良的历史舞台。宁夏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生存的地区, 从 2 万年前的水洞沟先民到清代满洲八旗徙入宁夏, 这中间迁徙和融合了不少民族成份, 影响较大的如戎族、羌、月氏、匈奴、鲜卑、吐蕃、铁勒、柔然、高车、突厥、回

收稿日期: 2006—06—29

作者简介: 薛正昌(1956—), 男, 宁夏固原人, 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宁夏社会科学》主编, 编审。

鹑、昭武九姓、蒙古、党项、回等众多民族,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融汇,尤其是先秦汉唐以来,大量华夏和中原汉族人不断迁居宁夏境内,与其他少数民族交错居住,共同的地域环境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包括多民族之间血统的交流。这期间,民族迁徙与驻足交替存在,战争阴霾与和平友好的历史不断推进着历史进程。值得一提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少数民族,也曾在宁夏境内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如万俟丑奴建立的高平政权、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尤其是党项人建立并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政权。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同样会带来文化的变迁,西夏立国后,西夏文化不但是宁夏这一时段的主流文化,而且是整个西夏辖境内的主流文化。

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格局,决定着宁夏军事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也吸引着历代西北游牧民族不断走进和迁出。南部六盘山(古陇山脉),北部贺兰山,是宁夏南北的两大军事屏障,也构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军事防线。入贺兰山屏障,沿黄河、清水河直达固原。由固原南沿六盘山东侧南下,顺泾水河谷而下,可直捣关中;也可横出河西走廊。肥沃的宁夏平原与交通枢纽固原六盘山连在一起,进可攻,退可守。于是成为历代中原政权特别重视的边陲之地,也是南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入居和南下的通道。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交通的形成、商业贸易和地方政权建制,体现的多是军事色彩。长城在宁夏,体现的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军事防御特点。战国秦长城,是早期宁夏南部防御北方匈奴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防线。现在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宁夏境内长城防线的修筑,旨在防御北方蒙元残余军事力量的南下。从宁夏地理格局看,蒙元兵锋的南下,西线以中卫、黄河、清水河为通道,直抵固原;东线在花马池破边墙,沿韦州、下马关、豫旺直达固原,明代陕西三边总督府设立固原,就是这种战略防御地位的体现。1928年宁夏正式建省,是各种历史因素积淀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文化,是一个社会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民族群体,都会给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正是由于宁夏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尤其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民族文化的不断影响,包括政权组织、经济类型、生产方式、文化艺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等的不同,生成并演绎了宁夏区域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在整个西北历史文化中闪烁着独具特色的光环。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宁夏历史文化生成

以黄河为母体,宁夏的地理特征基本是两大块:黄土高原区与宁夏平原黄灌区。宁夏南部固原,地处

黄土高原边缘。突兀峻秀的六盘山孕育了泾水和清水河,也孕育了宁夏境内的早期文化。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肥沃的黄土,疏松的结构,对于使用石器较原始生产工具的古人耕种来说,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六盘山还生成了巨大的高原湖泊,滋润了面积广大的原始森林和草原植被,自然地理环境极好。朝那湫,就是高原湖泊的象征,更是先秦汉唐文化生成的渊藪。清水河,穿固原故城,萦萦绕绕,向北汇入黄河,是郦道元笔下描述的重要的黄河支流之一。就是这条清水河,将宁夏南北紧紧地连接起来;就是这条清水河,为远古人类的栖息、生存和繁衍提供了黄土土地与河流的优良环境,是古人理想的选择地;^[1]就是这条清水河,生成了萧关古道,成为中原王朝军队北上、草原游牧民族战骑南下的通道;就是这条清水河,成就了古丝绸之路的走向,承载着中西文化之舟的东来西往。

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说,清水河谷地就是黄河文化的滋生地。钱穆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里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自身,他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2]依着历史的发展走向和钱穆的观点看,清水河流域在文化生成及在中西文化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

黄河流经的宁夏平原,地当黄河中上游。自兰州以下,黄河沿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穿行,两侧是万壑涌动的峰峦。进入宁夏境内,又穿越两道峡谷,一是黑山峡,一是青铜峡。由于受鄂尔多斯台地的阻挡,黄河出青铜峡后转折北上,形成了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的南北地理框架,黄河孕育了宁夏农业文明与文化。无论是“塞上江南”,还是“天下黄河富宁夏”,都是历史以来对宁夏黄河文明的盛赞和美誉。

历史上的宁夏北部,气候四季分明,生态农牧皆宜,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汇聚交流的地区。开宁夏农业灌溉之先的秦渠,是宁夏平原农业文明的象征。汉武帝集重兵反击匈奴,宁夏平原大规模移民与屯垦,是其后勤保障和主要依赖的地区之一。唐代的宁夏平原,已是美丽富饶的绿洲,是镶嵌在贺兰山与毛乌素沙漠之间的一颗翡翠,沿丝绸之路而过的胡商、文人和各国使节等各色人都为此而激动和赞慕。一千多年前途经宁夏平原的唐代诗人韦蟾就留下了“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这个让后人向往的描述,其实涵盖了宁夏平原农业文明与生态景观的多重文化意义。

民国建省后,宁夏的自然地理单元纳入了贺兰山

以西阿拉善厄鲁特旗、额济纳吐尔扈特旗干旱区沙漠、沙漠之地,是相对于银川黄河冲击扇平原、南部固原半农半牧区的独立地貌特征,在隶属关系上前后有过变化。六盘山、贺兰山,黄河、泾水与清水河,由它们构成的自然地理大框架,成为宁夏自然地理文化生成的渊藪。

二、人文地理环境与宁夏历史文化生成

宁夏地理位置,处在六盘山、贺兰山、泾水、清水河与黄河之间,自然地理环境为人文地理环境提供了生成与发展的时空,尤其是早期南部固原地区。六盘山(古称陇山)东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六盘山成为远古人类文明生成的桥梁和纽带,它将六盘山东西从地域上有机地衔接起来。

六盘山以东的庆阳,是周祖文化的发祥地;六盘山以南的陕西宝鸡,是神农炎帝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周文化延续发展的地方;六盘山以西的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固原正处在这三大文化板块交会并向北延伸的边缘。周祖文化,根在陇东庆阳,庆阳城的“周祖牌楼”,城东的“周祖陵”,再现的是周文化发迹演进的历史。周宣王时发兵“大原”(固原),征服玁狁的战争,就是周文化影响固原的历史折射。生成于陕西宝鸡市南的天台山,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神农炎帝部族创立的姜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部落正当游猎牧野的时代,对周边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人类对野羊的驯化饲养,始于炎帝时代。甲骨文中描述“羌”字的造型,是像一个人头上顶着一幅完整的羊角,敞开着双腿奔跑狩猎的形象,象征着炎帝部落姜、羌部族是以羊为图腾而崇拜的。这种狩猎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宁夏早期地域文化的形成。固原彭阳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羊牌饰造型,直接突出羊的胡须、耳朵和角,尤其是近乎覆盖全身的粗大的羊角,可能就是这种文化影响的历史遗物。如果继续向北推移,贺兰山岩画中很多大角羊造型,也是与炎帝时代狩猎民族的羊图腾有联系的。因为,“羌族是贵以牧羊为生,生活在现今西部地区陕、甘、川、宁、青、新一带的游牧氏族部落。^{①②}天水的伏羲文化,同样是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生成的根脉,影响极其深远。其实,曾生存于固原境内的义渠戎(古羌),筑城立国,演绎着姜、羌文化,与周边尤其是秦国以武力抗衡,在六盘山以东的黄土地上生息繁衍了近千年,最后消失于秦国的统一战争之中。

由以上可见,早期地域意义上的周祖文化、神农炎帝文化、伏羲文化等对宁夏,尤其是南部固原历史文化的生成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政权建制折射的历史进程

安定郡——高平——原州——固原,折射的是宁夏南部固原的文明和历史进程。

固原,是宁夏境内最早设有县级建制的地方。汉武帝年间析置的安定郡,是当时特定军事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安居乐业、凝定静态的内陆文化思想内核。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固原历史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意义。高平,反映的是地理特点,是地理特征结构上的一种“黄色文明”,代表了固原所在的黄土高原边缘的地理环境。实质上,这种称谓也象征着一社会结构的一种稳定态势,潜藏着一种内在稳定型的文化含义。明代,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是明朝中央政府设在西北的军事指挥中枢。由“故原”到“固原”的演变,在继续体现传统的内在稳定的同时,军事意义上的色彩更浓。这些称谓及其演变伴随着固原的历史进程,也是整个历史演进过程在固原的缩影。

灵州——西夏——宁夏行省——宁夏府——宁夏省,折射的是宁夏北部的文明演进和历史进程。

灵州的名字,是因黄河而来,伴随着神秘的文化色彩。西汉时已有灵州县的建制,是宁夏北部历史悠久的重镇,唐代中期以前宁夏北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皆寄予灵州。唐太宗亲往灵州接受北方和少数民族首领的归附,唐肃宗灵州即位,西夏发迹的重要一站——西平府,也是在灵州。这些都是发生在灵州的大事,也是影响当时中国政局方向的大事。

公元1020年,夏王李德明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从此,灵州的历史地位转入黄河西岸的银川,宁夏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李元昊即位后,首先从文化方面改制,还党项民族的习俗,设军制,建都城,正式即皇帝位,国号称大夏,与宋王朝抗衡。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西夏国屹立在宋朝西北部辽阔的土地上。宁夏的大半壁河山为西夏所辖,在近200年的宋夏对峙过程中,宁夏南北部处在分离状态。成吉思汗或发兵或亲征西夏,经过6次军事较量后,西夏国走到了它的尽头,灰飞烟灭。但西夏的这段辉煌经历与整个中国历史共存,它神秘的文化色彩依旧震撼和感染着后人。

宁夏行省,是元代设置的行省之一。尽管当时省的称谓与后来省的涵义不完全一样,尽管当时省的建制比后来省的辖区大得多,尽管期间有过迁徙和撤罢,但它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次省的建制,而且从此诞生了一个已经走过了700多年历史的名字——宁夏。从当时特定背景看,宁夏的称谓是有着深层寓意的。宁夏,安宁的西夏,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西夏近200年历史的折射,元代人希望西夏故土从此安宁。宁夏行

省的建制罢撤后，宁夏府的建制一直沿袭到元朝灭亡。

明朝的宁夏，是一个特殊地区，是以宁夏镇的军事建制耸立在与蒙古兵锋对峙的前沿的。清代西北的战争结束后，直到雍正初年，宁夏才改卫设府，同时有了各县的建制。1928年，宁夏省正式设立。

追溯宁夏历代政权建制的变迁和走向，始终与军事和战争相关。西夏政权的诞生、兴盛和衰落，同样在抒写着“战争”的字样。由不同时期的称谓看，也是对军事和战争的诠释。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这些不同时期的名字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历史经历，再现的同样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四、移民与移民文化

移民在宁夏，自周朝至现代，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移民文化，是移民与伴随着移民而来的四方文化的大融合。现代意义上的宁夏首府银川，总是有人说它是移民城市，更何况历史上的宁夏的大移民。其实，宁夏的历史发展，是伴随着移民的历程走过来的。这里说的移民，包括因战争等各种因素的自然南下进入宁夏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包括中原政权对宁夏境内的政治性、军事性、经济性移民等。

地理意义上的宁夏，正好处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戎狄羌、北狄、鲜卑等民族频繁进退于这个舞台，成为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地区。从商周至明清的数千年间，宁夏境内民族众多，迁徙频繁。从文字记载看，西周时期主要是义渠戎、乌氏戎和胸衍戎的活动范围。春秋战国以后，境内已有县的建置，封建统治者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对峙与互进逐渐加剧，宁夏已成为多民族进入的重要地区。魏晋南北朝300年间，宁夏更是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区，先后进入这里的有汉、匈奴、鲜卑、羌、氐、羯、敕勒、柔然等。隋代和唐初，东突厥和薛延陀部先后控制过宁夏北端。贞观以后，宁夏南北安置过大量的包括突厥族在内的北方众多民族，而且有自治性的特殊管理形式。安史之乱后，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民族进入宁夏，包括大食的军队。吐蕃在宁夏南部驻军近百年。五代和宋初，居住宁夏的民族主要有汉、沙陀、党项、吐蕃等。党项民族建立西夏国后，宁夏南部先后属于北宋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统治。元朝，宁夏的民族构成又发生了变化，蒙古族以及从中亚、西亚来的许多民族进入宁夏。明代以后，宁夏的各民族迁徙大体稳定，汉、回两族成为宁夏民族的主体。到了清代，满族又成为宁夏的少数民族。

与此同时，或因军事的原因，或因政治的原因，或因经济的原因，历代中原统治者都要向宁夏迁入大量

的军队进行屯田，包括民屯、商屯。少数民族的南下，中原各色人的迁入，构成了宁夏古代民族大融合地域背景和实质上的文化变迁。大体梳理一下宁夏古代民族的迁徙演进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迁徙过程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本身就是文化融合，因为文化的生成与传播主要是由人来完成的，移民与战争的过程，为移民文化的融合展示了更大的背景和空间。比如，唐朝以来进入宁夏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和其他各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为一体。^[4]再比如，明朝初年宁夏已成为抵御元朝残余兵锋的前沿，为有效防御，明朝政府将宁夏北部所有蒙汉军民迁徙到关中，造成宁夏、灵武、鸣沙等地“空城”现象。数年之后的洪武九年（1376），政府又“徙五方之人实之”，将四面八方的人再迁入宁夏，这是一次宁夏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大更新。仅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历代移民屯田的军事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移民过程中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程度。

历史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与中原统治者移民于宁夏，是因为宁夏黄河灌溉农业的经济地位和宁夏自身的战略地位所致。宁夏水利的兴衰，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衡量中原与宁夏政局稳定的标志，再现的是移民与古代开发宁夏平原的历史范例。西夏、元、明、清诸朝，都是历史上移民屯田和兴修水利的高潮期，移民与文化融合同步。诸如李弼、杨广、李世明、李亨、郭子仪、刘昌祚、西夏梁太后、蒙古铁木真等，都是曾经驰骋于这片土地上的风云人物，但在他们的身后，潜在的仍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五、历史文化的多元性

宁夏地貌特点丰富，高山与大河相间，黄土高原与黄河平原相连，其间地域广阔，气候适宜于多种经济发展。在这块古称关中塞外的广袤大地上，孕育了宁夏丰富而灿烂的历史文化。依考古发现的时序看，3万年前的“水洞沟文化”是宁夏平原早期文化类型的代表，包括此后的“细石器文化”。南部固原境内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系列的“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店河—菜园类型”，以及齐家文化等远古人类文明。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宜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宁夏境内的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两种文化的历史遗存，南部固原比北部更多一些。远在数千年前，各少数民族就在六盘山区、清水河沿岸耕牧，义渠戎最具代表性。固原中河西周墓葬出土的铜车马，是西周文化进入宁夏的标志；固原杨郎春秋战国墓的发掘，数十座墓葬出土的

青铜器,尤其是各种纹饰的透雕牌饰,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青铜文化在宁夏南部关中边缘的渗透和体现。战国时期乌氏、朝那县的设立,就是宁夏早期多民族文化的政治体现。秦汉以后,有匈奴等西北少数民族“安逐水草,习射猎”的游牧狩猎文化;有“城郭之可守,墟书之为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的城邦农业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多元混合体。同心倒墩子匈奴墓葬出土铜、铁等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最具特色的是浸润着匈奴文化的透雕铜带饰一类。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成为西北乃至中亚民族融合并进入中原的历史舞台。尤其是丝绸之路的畅通,使西域和中亚文化沿丝绸之路在宁夏留下了令世人震惊和关注的文化遗存,固原数次发掘出土的大型墓葬,如固原北魏漆棺画、李贤墓等,先后出土了有代表性的最具西域和中亚文化特色的各类文化遗存。隋唐以后,与中原密切相关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宁夏有缘,地域角色扮演了吸纳多重文化的身份,农、工、商各业,佛、道、回诸教,更是呈现出地域文化层面上的千姿百态、风格相异的多元文化特色。盐池县苏步井乡唐墓出土的雕刻在石门扇上的“胡旋舞”造型,不但是唐代文化艺术的珍品,更是西域文化在宁夏的融入和反映。西夏文化,是宁夏地域文化的一大亮点。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形成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宁夏地域文化的主体文化之一。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宁夏地域文化是三秦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文化的主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文化、贺兰山岩画文化、石窟文化、西夏文化遗存、寺庙文化、伊斯兰文化建筑、沙漠文化、黄河文化遗存等,是文献记载以外的至今仍牵动着游人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是固原战国秦长城,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以不同的形式承载着的各个时期活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宁夏多元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史文化的融合性

宁夏历史文化的区域性,与周边各地域文化都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是周边区域文化圈的一部分。宁夏的地理位置,正当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上,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宁夏在多元文化方面的相融交汇与吸纳。古代印度、伊朗、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几大文化源通过西域源源不断进入中原,而宁夏就处在这个多元文化出入的重要地带。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并得以充分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灵州和固原,不但将东进的西域文化输入中原,而且自身也在最大可能地吸收着各类

与地方文化相适宜的西域文化成份。除史书有少量记载外,宁夏历史文化及其融合,主要体现在近百年间地下考古出土,尤其是近30年间的考古发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南北相继发掘出土了一批战国至隋唐时期的墓葬,先后出土的大量有研究价值的凝聚着中西文化内涵的文物,足以说明战国至汉唐间西域文化在宁夏的多元表现与融合程度。无论是少数民族墓葬,还是汉族墓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内涵都呈多元状,体现了中西文化合璧的历史特点。重要的墓葬出土有:1983年发掘的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波斯萨珊时期的工艺品等;1983年同心倒墩子出土的匈奴透雕铜牌饰;1985年盐池唐墓出土的西域胡旋舞雕刻造型;1996年中日联合发掘的北朝重臣田弘墓,出土有东罗马金币等珍贵历史文物;1987年固原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青铜文化遗物,等等,这些出土文物再现了东西文化交流在宁夏的灿烂历史。同时,还相继发掘了7座史姓墓葬群,且普遍出土有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中亚乃至西方文化的文物。这些墓主人或为“昭武九姓”后代,或为“粟特人后裔”。他们以族聚的形式在宁夏历史上出现,这除了文化上的中西交流外,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人种”的汉化程度。

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中西文化、草原文化遗物,是宁夏区域文化融合与发展过程中文献资料未能记载的实物和见证。此外,须弥山石窟等石窟文化、伊斯兰建筑文化等,同样是物化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象征。

七、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延续,总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会过程中走过来的。当先前的外来文化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之后,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或大规模的屯田,又会带来新的外来文化。整体上,它们都是宁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纵向考察宁夏历史文化,它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一是移民屯垦,二是御边与战争,尤其是后者。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本地传统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又会不断地融入新的内容。当然,不是说宁夏没有产生文化士人的土壤和条件。汉代也出了不少名垂青史的人物,如安定郡的皇甫谧、梁竦、梁鹄,北地郡的傅氏家族等。但透过历史的隧道审视宁夏历史文化,古人“关西将”的析论还是有其道理的。这种军事背景下的外来文化,影响了本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外来文化,一是指历代为官宁夏的文化人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明代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制,前后50余位,他们大都是进士出身,以部院大臣的身份为

官固原。这些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渊藪,他们在固原发展教育事业,创造城市文化,留下了不少描写固原军事战争、历史古迹、山川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篇。

《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固原州志》、《宣统固原州志》等的编纂和成书,是外来文化的集大成者。北部银川不同于固原,既有像庆王朱栴及其《宁夏志》这样的外来的文化载体,也有当地已生成的较高层次的文化人,如《嘉靖宁夏新志》等都是由宁夏本土人来编纂完成的。胡砺汝、管律等人,是外来文化本土化了的宁夏文化人。二是指重大历史事件孕育的外来文化遗产。秦始皇巡边与开发“新秦中”;汉武帝拓边与析置安定郡;唐太宗前往灵州主持草原少数民族大盟会,接受北方草原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唐肃宗灵武即位,整顿兵马,扫平叛乱,恢复大唐秩序;成吉思汗在攻灭西夏的前夜病逝于六盘山;清康熙宁夏亲征噶尔丹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在推进中国政治、军事宏观进程的同时,对于宁夏的历史文化的繁荣同样产生过重大影响,生成和浸润了宁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外来文化在宁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皇室王府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明代初年,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栴就封宁夏后,经营了一个以王府、地方官员层文化人为群体的文化圈子,聚会吟咏,留下了大量描写宁夏北部山川风光和历史古迹的诗作。

八、诗旅文化的军事特征

在宁夏的历史进程中,自先秦至清末,军事与战争近乎相随而来。从早期的《诗经·小雅·六月》、《卫风·淇风》、《北征赋》,到唐代王维的《使至塞上》、《送卢潘尚书之灵武》、《夏竦何所俱》,以及明、清描写发生在宁夏的与战争有关的诗,再到1935年毛泽东翻越六盘山后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都描写战争与军事。从时间跨度看,上自周代,下至现代,遥遥数千年;从表现内容看,既有建功立业的倾诉,也有对战争场面的

描写和刻画;既描写帝王出巡的宏大场景,也流露和倾吐了对战争带来的苦难的忧怨和义愤。从作者群看,既有一腔正义的文人,也有身兼重大军事指挥权的政治家,更有创建新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诗旅文化,蕴藏的背景很大。它既表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特点,也折射出了历代中原王朝当时在北部的军事和战争的经历。此外,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水乡风光,也是让世人所描写和歌颂的,尤其是明代以来。朱栴笔下的《汉渠春涨》,成了明代宁夏的塞上景观之一;明代人刘芳猷的《朔方》诗云:“西峙贺兰爽气凌,东流黄水自奔腾。人烟漠漠联村落,畎亩鳞鳞傍水塍。塞北江南名旧得,嘉鱼早稻利同登。偶看儿女弓刀戏,不觉临风百感增。”着力描写了田园绿洲风光。此类诗作,也是宁夏诗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的文化资源,实际上是历史以来各民族文化共同创造融会的结晶,体现的是其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正因为如此,才不断演绎和形成自身的文化风格:汉唐文化、移民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边塞文化等,展示和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宁夏历史文化风格和独有的特色。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宁夏历史文化与地理提供了全方位的时空视野,展示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的背景窗口和宏观的演进过程。同时,为研究宁夏区域经济发展、繁荣宁夏地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历史参照,尤其是旅游文化的开发;也为宁夏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大量较为系统的研究资料 and 多个层面上的研究空间,并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更大背景上,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北地区历史地理与文化的研究和繁荣,为西北地区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开发与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孕育黄河文化的自然环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

[3] 彭曦.迷盘铭文的注释及简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5).

[4]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方建春]